

# 中国儿童文学开创现代传统的路径<sup>〔\*〕</sup>

吴翔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中国儿童文学元概念的特殊性是探究其传统建构的原点。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门类,儿童文学传统建构取径于“远传统”和“近传统”的一体化。“远传统”是一种传统内的资源,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保障了中国儿童文学民族性的精神品格。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传统是儿童文学的“近传统”,在思想、语言和人三者的现代化中,扩充了儿童文学现代化的精神元气。受新文学思潮的牵引,中国儿童文学接续了“人学”传统,并开启了儿童发现及现代化的现代之旅。这是其持守学科自主性意识的传统再造,体现了一体化与主体性的辩证统一。两者丰富的联动,深度地介入了百年新文学参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中国儿童文学;远传统;近传统;传统的发明;再造传统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6.010

中国儿童文学是否拥有传统,这原本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因为任何一种文学都不是凭空发生发展起来的,都要倚借内外文学传统的滋养。同时,经过历史化的过滤、洗礼,沉积下来了的诸多经验、思想与精神又开创了新的传统。换言之,中国儿童文学不仅传承、接续着传统,而且还发展、开创着新的传统。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门类,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必然仰赖现代性的文学传统,借用这种资源来解绑旧思想、旧文化对儿童现代化的束缚。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的一种民族文学,儿童文学也不能析离民族化、本土化的文化传统,并要借此来抵御、对抗域外文化的侵蚀。从传统向后传统时代转换的过程中,传统

与现代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绝对分立的权威主义被否弃,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参照、相互融通的关系。如何理解传统取决于人们认知事物的出发点,以及设置怎样的“现代观”。<sup>〔1〕</sup>中国儿童文学元概念的独特性,是探究其传统建构的逻辑起点。反观其对待传统的态度、情感和方式,又可以折射出中国儿童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门类的特殊性,进而为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性质和品格提供重要参照。

## 一、传统内的转化:从“远传统”中 获取民族性资源

何谓中国儿童文学的“远传统”?要回答这

作者简介:吴翔宇,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儿童文学发展史”(21&ZD257)的阶段性成果。

个问题,先要弄清楚“远”到底是作为一个时间概念还是一个性质概念。如果是一个时间概念,那么只需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源头往回追溯,返归至中国文学的古代时段,找寻催生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发生的思想和精神资源。时间层面展开两种视域:一是古与今的演变,二是中与西的对话。如果是一个性质概念,那么这种“远”主要体现在各自质的规定性及文化之“隔”上。不管哪一种视角,要充分汲取“远传统”的资源都需要跨越这一距离,开展古今演变与跨文化的对话,冀望从区隔中搭建文化交流的通道。总而言之,时空层面的转换及文化性质上的融通,为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远传统”延拓了中外与古今的结构关系。

尽管这里的“远”包含了传统文化与域外文化两重视野,但从传统本身的赓续来看,所谓“远”或“近”主要以同质性的内部文化作为论说的基石,不同质的各种传统本身就无所谓远与近。只不过,在传统内来讨论远近亲疏时,也离不开传统间的参照、作用及影响。基于此,中国儿童文学“远传统”就界定于中国文学的“传统内”,是一种内源性的视角。“内源”是相对于“外源”来说的,是一种内部的因素,落实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谱系中即体现为表征中国性、民族性的质素。用费正清的话说即是“传统内”的综合性力量,浸润于“中国方式和环境的日常连续统一体”。<sup>[2]</sup>这种切近内在性的意识对于探寻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非常重要。从描述性概念的角度看,中国儿童文学的本体特质体现在“中国”“儿童”与“文学”三个核心要件上。前述传统内的关注正是对“中国”及“中国性”的本体观照,为另外两个要件“儿童”与“文学”的探求提供了逻辑起点。

当我们将视域移至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谱系中时,对于远与近的理解会更为客观公允。于是,这里的“远传统”指向中国古代悠久的文化精神积存,而“远”无非就是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之间的区隔。由此看来,在强调中国文学

传统内的切近、接纳、遇合的同时,也要非常注意其发生发展过程中质疑、对抗与反叛的另一面。有了这种双向的注意,能助益我们理解传统本身的意涵。传统的动态性及这一历史化情境下的紧张关系,形构了中国文学现代演进的样态。在百年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对中国文学自身问题的逼近,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自我内部的问题,应该在世界的范围内来考察。而这种视域的延拓比照,不是外在力量强加上的,而是中国人从“天下中心”向“世界之一”转换中深切地体悟出来的,表现为“坚持和凸现中国主体性的存在”。<sup>[3]</sup>从这种意义上来讨论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问题,势必会深化我们对“中国之世界”及“世界之中国”的认知。即便是论说“传统内”的议题,也会将内外语境及相互关系作为前设背景,而不至于窄化和固化其丰富之意涵。进一步说,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生成不仅寄寓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动态语境下,而且借助作家对于这种动态语境的应对、书写,来揭示和彰显中国文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进程的努力。

在古人的思维意识中,我们很难找到“儿童”作为“完全生命”的论述,儿童依附于成人社会的话语体系内,没有地位,也没有声音。在以成人本位的家长制中,儿童只是“缩小的成人”,<sup>[4]</sup>其身心都被成人的主导话语扭曲了。由于看不到儿童之为儿童的主体价值,成人不会专门创作一种文学类型供儿童阅读,儿童文学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来,儿童能接触到的主要是蒙学读物和成人读物。前者替圣人代言的说教性浓厚,而且文学性也不强。后者并非专为儿童创作,其思想、语言和价值都与儿童的接受能力有一定的距离,对于低幼儿童来说这种障碍会更大。成人这种弱化、遮蔽儿童主体性的儿童观,阻滞了儿童文学在中国古代的创生。有缺憾的儿童观“扼杀”了儿童文学的发生,而没有儿童文学的古代社会又进一步加剧了儿童观的落后。这种恶性循环的最大受害者是儿童,儿童缺乏文学滋养不仅不利于自身发展,而且最终会阻碍社

会进步。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新文化人在推动文学革命时要极力开创儿童文学,其根由在于改造儿童、推动社会进步。他们预想到了儿童文学能形成郭沫若所谓的“宏伟的效力”,是疗治社会“起死回春的特效药”。<sup>[5]</sup>不过,在这里,郭沫若高扬儿童文学的社会功用时征用了儿童的新人身份,立人与立国的归并会产生极大的社会效应。这当然是用现代打捞历史的“后见之明”,但这种“发现”对于此后儿童文学的“发明”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没有古代形态,并不意味着找不到传统的根脉,或否弃前传统的价值。中国儿童文学自“五四”始才真正创生,这也不意味着它是缺失本体基石的空中楼阁。对儿童文学到底是“古已有之”还是“现代生成”的讨论,其意义不在于时间节点而在于性质的定位。类似于中国现代文学,其历史起点曾引起过诸多争议,王德威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sup>[6]</sup>即是其中一例。从时间的先后顺序看,晚清早于五四,要系统研究五四新文学自然不能忽视晚清文学及其影响。同理,要探究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也自然绕不开晚清文学这一独特的存在。王德威的上述观点将晚清(文学)视为五四(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从“没有……何来……”的句式就能洞见这种逻辑关系。在以五四新文学为标准的界碑下,晚清文学、近代文学尽管没有作为反例而存在,但也常是处于被遮蔽的状态。面对现代性所制造的新文学“神话”,陈思和曾不无感叹地说:“我们自己把本来很丰富的传统简单化了,形成了一个想像(象)的传统。”<sup>[7]</sup>言外之意,要还原原本丰富的传统的样貌,不能运用绝对化、本质化的观念,粗暴地切断传统的脉息有失公允。从王德威写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的初衷也可说明这一点。他持守着一种“在前现代中发现后现代”的观念,其目的在于“打破文学史单一性和不可逆性的论述”。<sup>[8]</sup>由此说来,释放晚清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是表面,重审五四新文学及文学史叙述才是真正的意图。不过,王德威

看到了“被压抑”现代性的巨大反弹力,从晚清文学到五四文学,现代性渐次收缩,五四文学只是“窄化的收煞”。这种“退化”的现代性的论述让王德威陷入了左支右绌的困境:一方面要拉近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的界限,以此照见现代性的演进趋势,另一方面又在“压抑”的作用下断开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关联,而后者无法为前者提供合理的学理逻辑。这种混杂的话语机制使得王德威的这一学说遭致学界的批评,譬如李杨提出的“两种读法”<sup>[9]</sup>就是适例。将晚清文学的新变与五四文学纳为一体看待,有着合理性。毕竟任何一种文学的发生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关键的问题是这种“联结”“纳入”不应是一种“取代”或“超越”所能概括的。随意降格五四新文学的价值既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也不符合文学传统延传的基本规律。对于两种文学形态的关系,温儒敏说得很清楚了:“晚清的文学‘新变’只是‘量变’,离‘五四’前后的‘质变’还有一个过程,‘五四’作为重大历史标志的地位,是晚清‘新变’所不能取代的。”<sup>[10]</sup>文学传统本身预设了古今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才能更好地照见文学传统的延传。中国现代文学如此,中国儿童文学也如此。

在儿童文学领域讨论“古已有之”的问题,表面上讨论的是一种文学传统的源头,但实质上却是对其性质的界说。不认同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研究者,其理论逻辑是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概念、观念,因而难有儿童文学的实际形态。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不是一个“实体”,其产生有赖于思想与观念的先在性:“古代文献里从未出现过‘儿童文学’一词,可见古人的意识里并没有‘儿童文学’这一个概念。”<sup>[11]</sup>这种概念先于实体存在的观念显然无视作为一种非自觉的儿童文学的可能性。儿童文学的生成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其自主性及接受本身的主观性都无法确证儿童文学是一种纯粹观念的产物。而承认“古已有之”的研究者则从中国古代文化中作知识考古,他们发现中国古代孕育了儿歌、

童谣、民间故事等口承文体,并找出了相关文本予以例证。王泉根从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变迁史中洞见了这样的事实:“只要有民间文学的存在,就有文学的存在。中国儿童文学也是如此,只要有民间儿童文学的存在,就有中国儿童文学的存在与发展的前提。”<sup>[12]</sup>这看似找准了“古代儿童文学”确凿的学理依据,但实际上我们也不能忽视的另一个事实是:任何一种新传统都不可能产生于完全断裂的文化土壤中。因而要想在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中找到关联点是非常容易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民间的口头文学“述”大于“作”,多是一种“耳治”文学,难以与“目治”的儿童文学类同。关于这一点,周晓波的论断可进一步深入回应这一问题:“古代没有专门的儿童文学,现在所说的古代儿童文学,是后人从大量民间文学创作和古籍中挖掘、整理出来的。”<sup>[13]</sup>换言之,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古代儿童文学的话,那也是后人以一种“后见之明”的思维来拣选中国传统资源,这种挖掘与整理遵循的是“史家的逻辑”而非“历史事件的逻辑”,从而反过来也说明了中国古代不存在专门、自觉的儿童文学的观点。

持“五四”起源论的研究者充分肯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认为其创生与现代思想观念的变革密切相关。对此,刘绪源曾这样断言:“中国本来没有儿童文学,有了‘五四’新文学以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这话很对,这是大家公认的。”<sup>[14]</sup>在这里,“真正意义上”意味着中国古代的作家没有自觉为儿童创作的意识,同时也不可能以现代儿童观来指导其儿童文学创作。与此同时,更多的研究者是从“建构”的“观念”出发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问题:儿童文学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只有“建构”的“观念”的儿童文学才是儿童文学,由于中国“古代文献里从未出现过‘儿童文学’一词,可见古人的意识里没有‘儿童文学’这一个概念”,因此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建构”的“观念”的儿童文学,所以中国古代是不存在儿

童文学的。<sup>[15]</sup>由于确立了现代的儿童观,成人才将儿童视为具有独立个性的主体,因而儿童文学才得以产生。

无论是从“儿童”还是“文学”着眼,儿童文学都拥有区别于其他文学门类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其现象和思潮都具有同一性和整体性。这样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存在于连续或断裂的现象之中,将研究的视角聚焦古远的历史是有效的。抛开上述论争的理论迷雾,单从古代遗留下的物质、文化、思想、精神资源中去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的古今对话具备可能性。从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的角度看,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的生成可以从古代找寻“亲缘关系”。<sup>[16]</sup>尤其是“幻想类文体家族”经过转换、变异,对于中国童话文体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体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体裁,也是思想和语言的体式。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尽管没有直接化用为儿童文学的现代体裁,但经过“儿童文学化”,尤其是现代化转换后,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的自觉意义重大,并在民族思想和民族形式的传统延传中获取了新的发展动力。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传统内的转换不是简单的语言形式变革,而是内蕴着思想、文化、价值的革新。而推动这种转换必须遵循现代性的标尺,逐渐形成更加适合表现现代人思想情感的文学形式与规范,一起更好地服务于儿童的精神成长。

## 二、新文学的牵引:“近传统”的 育化、编织与融通

毋庸讳言,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离不开新文学的引领与话语支援。换言之,没有新文学对于古代文学传统的批评就不可能有儿童文学的创生。新文学最大的功绩是人的发现,当儿童的发现归并于这一现代传统时,就预示着儿童文学融入了新文学的体系中。因而,中国儿童文学的“近传统”就是新文学所开创的现代传统。当立人与立国统合时,这种现代传统之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意义得到了提升。从“儿童的发现”到

“儿童文学的发现”体现了一体化的逻辑,没有“儿童”的出场,就不可能有“儿童文学”的发生。这其中,现代思想对于儿童文学的牵引力是非常大的,在“儿童”成了一个现代的概念之时,也演化出同为现代概念的“儿童文学”。

立于新文学传统来考察,就会发现这里的“近传统”之所以“近”,主要在于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同源性与同质性。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别,新文学传统之“新”表现为思想、语言及人之新上。“人的文学”替代了“非人的文学”,确立了中国新文学思想的锚点。从古代文学传统中独立出来的“百年新文学”,其意义究竟何在?这其中,“现代”的价值非常关键,是现代之质地刷新了中国文学的传统,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关于新文学标示出的时间意义,陈晓明的论断可谓切中肯綮:“这一百年可以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传承的时间历程中独立出来,如果不是因为它具有‘现代’的意义,并且因为这个现代的意义有力量来继承、变革并且确立‘传统中国’,那么‘百年中国’的独立时间单位则不可想象,并且也没有必要。只有‘现代’使这‘百年’独立成史,独立于世,成就自己。”<sup>[17]</sup>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转型,类似于“新的时间开始了”,古今之变落脚于文学也就是新旧之异。传统中国与百年中国的质的差异性,推衍出百年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质的差异性。

中国儿童文学紧跟新文学的步伐,受到新文学传统的滋养,也扩充了现代的精神元气。换言之,是“现代”成就了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现代的产物。不过,中国是后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进程是受动而非主动的。在这种情境下,中国儿童文学也铭刻了这种被现代化的印记。具体来说,在对待传统及传统文化时表现出复杂的心态。在新旧转换的框架里,反传统是为了建构新传统,新文化人以西方现代思想为改造中国文化的武器,一股激越的反传统的思潮伴随着思想启蒙而延展至文学等领域。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稳固及墮力,修补式的改良显然于事无补,无法

撼动中国“主奴”社会的结构。按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对“主奴”关系的概括,维护主人与奴隶关系包括三个环节:“统治”“恐惧”和“培养或陶冶”。<sup>[18]</sup>三者具有一体性,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主奴之间原本是一种控驭与被控驭的权力关系,黑格尔将其置于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中,从而洞见了自我意识运动“辩证发展”的事实,这也成为此后学者津津乐道的“主奴辩证法”的来源。在中国社会新旧转型之际,先觉者发现了传统文化之于新文化传统构建的斥力,主奴之间制造了稳固的“文化共同体”,同构了启蒙的“颠倒”。<sup>[19]</sup>在此情境下,启蒙者如果低估了传统文化的顽固性、延传性,就无法切断强大的旧文化机制。这也不难理解林毓生所谓“五四式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源自“根基深厚的中国传统”的塑造。<sup>[20]</sup>至于这种激烈的反传统思潮是否真如林毓生所说是受儒家传统一元论的影响,则值得商榷。五四启蒙者确实是将中国的文化传统视为一个整体,反传统者的矛头也指向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整体性的存在。将中国新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界分,是为了凸显前者的特性,奠定此后“断裂说”的理论基石。循此逻辑,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不再是盲目的继承问题,而是一个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问题。为了修正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否定,林毓生提出了“创造性的转化”命题,其内涵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性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sup>[21]</sup>从“全盘否定”到“创造性转化”无疑是理论自觉的一种趋势,遗憾的是,林毓生将转化的向度锁闭于“有利于自由民主”上,则限制了该命题的理论阐发。

反传统与学习西方具有整一性,两者互为表里、双向发力。即反传统需要西方现代思想的支援,西方资源的引入有助于反传统的推进,促发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而转换文化传统又进一步推动学习西方为我所用的诉求。于是,世界性与民

族性都介入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转换之中,两者缺一不可,互为他者。在此意识的引领下,中国新文学以启蒙为手段,开创了有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新的文学传统。受惠于新文学开创的人文传统,中国儿童文学不断纳入新文学和世界儿童文学范畴。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是其《人的文学》的延展与细化。在提出儿童文学概念时,周氏认为儿童是“完全的个人”,<sup>[22]</sup>有文学的需要,而“圣经贤传”显然无法满足儿童的要求,于是基于儿童的主体性而推导出儿童文学,这与其论定《人的文学》时思路如出一辙。作为时空体存在的人取代宗教和社会所界定的人,在文化史上是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sup>[23]</sup>自此,人不再是历史运动之外的他者赋义,而是历史化中自我的确证。于是,人的现代化与社会历史的现代性就具有了同构关系,这即是伊夫·瓦岱所谓“时间职能”的现代性内涵,现代性存在于“创造主体和主体的目光中”,这种人成为主体性的现实“使时间成为主体的时间”。<sup>[24]</sup>“儿童”是“人”的一种具体化的存在,在全新的“人的文学”谱系中推演出的“儿童文学”,必然也是现代的、全新的。概言之,从“人的文学”到“儿童文学”体现了启蒙知识分子基于“人学”系统的推演,从而将“人”的内涵扩充至成人与儿童“完全生命”的畛域,由此铸就了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的精神基础。<sup>[25]</sup>这种一体化的编织、融通确立了儿童文学承继新文学传统的合法性,在此后的文学现代化大潮中,作为“近传统”的新文学引领了儿童文学的发展。

西方现代思想要想凝聚为中国新文学的资源,必须要经过一次中国本土化、民族化改造的过程。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一样,没有现成的资源可供直接吸纳,择取、过滤、改造必不可少。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拥有中外两种资源,两者一远一近,构成了一种综合性的力量。向外扩展世界性的视角、向内汲取民族性的精华,是新文学与儿童文学学人的共识。译介域外资源、整理传统资源、创作本土文学作品是中国儿童文

学三种发展进路,这与现代文学别无二致。值得说明的是,三种路径尽管出发点、方式各有差异,但前两者的开展是为了育化中国本土文学创作服务的,其主导的路向和重心落脚于现代作家的新文学创作上。存在着“时间差”的中西文化,在彼此相遇时产生了非常大的“文明的震撼”。为了不至于产生“不在历史中”的后果,新文化人不再耽溺于文化的自足、自满,译介域外资源的目的是无自主性的跟随、认同,而是希望借西方先进文化来涤荡旧文化的弊病,再造新传统。不过,先觉者的心情是复杂的,从文化复兴的角度看,要“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就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向西方学习又有可能遮蔽中国文化的传统,进而“失固有之血脉”。<sup>[26]</sup>鲁迅提醒“鹜外”者要特别注重“趣内”,即是从世界性与民族性辩证的角度来说的,于今天依然有意义。经过了民族性、本土化淘洗的异域文化事实上已然成为一种中国化的资源,在这种内化中演化为中国新文学传统生成的有益质素。相对于现代文学接受西方资源,中国儿童文学接受域外资源的范围、数量、层次都相对窄化,主要集中于“儿童”或“儿童文学”相关的领域内。有时这种域外资源的接受不是直接的,而是转借现代文学接受域外资源的成果,这些特质都体现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亲缘关系。

关于地域文化传统,学界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别。费正清高度评价“面海的中国”的“小传统”,也洞见了“农业—官僚政治秩序”这一“大传统”的封闭性。<sup>[27]</sup>这种地域人文传统的分野看似有些笼统,但对于理解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启发。严家炎认为,地域对文学的作用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地域文化是其“中间环节”。<sup>[28]</sup>近年来,与地域文学相关联的概念“地方路径”也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地方路径的提出实质上是对此前空间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域文学、地域文学的一种深化。地方路径和地域文学都是动态的概念,前者意味着将路径动态化,包括路径的获取、形态、运用等

方面的内容。而后者的动态性体现在其与其他区域文学、整体文学的联动上。相对而言,地方路径更注重其介入整体文学的方案,而地域文学则更突出其自足的系统及内在结构的贯通。无论是地域文学还是地方路径,都要确立其主体性,它们的存在不是依赖整体文学的体系才具备合法性,两者自有其独特性及主体性。事实上,地域文学或地方路径也是切近整体文学的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和路径的基座是中国。确立了这一坐标后,地域文学与地方路径的动态性才得以夯实于中国大地。从整体到局部来看,受到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宏观性的影响,地域文学的丰富性、特殊性曾屡遭遮蔽。基于这种自上而下的理论偏误,地方路径这种自下而上的知识装置也就应运而生。在这里,地方并不是溢出整体系统的他者,是“中国”本身。<sup>[29]</sup>有此认知,我们不能作简单的条块分割,切断“地方”与“文学中国”的有机联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探究中国儿童文学的“近传统”,从地域文化的角度不啻为一种新视角,整体与局部的关联有效地介入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内部,助益从文化的流转中看取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结构及关联。

除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差异与互动外,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包含了两种资源,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古代文化传统,二是“五四”开始形成的新文化传统。<sup>[30]</sup>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这两种传统中前者属于“远传统”,后者则属于“近传统”。中国儿童文学脱胎于新文学,自然接续了这种表述现代人思想与观念的文学传统。这种“近传统”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品格、精神气度的生成起到了奠基作用。“近传统”的择取有助于为“远传统”创造性转化提供现代标尺,保障其现代性的方向。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所获取的动力源自新文学传统,现代话语深层次地塑造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精神品格,围绕着“儿童”而展开的儿童文学实践与现代文学的新人想象有着共同的旨趣。“作为成人的新人”与“作为儿童的新人”有效联结,获取了

在“全人”的视域下观照文学“为人生”的新传统,从而扩充了百年新文学的深层结构及现代意涵。

### 三、“传统的发明”:百年中国动态历史化中 断裂与再造

传统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它不可能瞬间生成,需要在历史运动中不断沉积,形成相对恒定的范式,并在现实生活中起到规范性的作用。落实于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它存在于百年中国动态语境之中,成为表述人们现代儿童观推动儿童身心发展的思维和审美方式。至于具体要多长的时间才能算得上“传统”的问题,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认为,至少要持续三代,经过两次以上的延传。<sup>[31]</sup>这当然是一个约数,时间长度的限定对于传统在历史中生成的本义是一种逻辑的接洽。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已有百年的历程,从第一代作家叶圣陶、茅盾、郭沫若等人算起,至今已历五代。从时间层面看,中国儿童文学是具备开创传统的基本条件的。但对于传统的要义而言,时间长短显然不是问题的根本,更为关键的是文学传统要沉积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范型,进入文学的知识化生产过程中,并参与当前的文化建构。

中国儿童文学受现代文学传统的引领,但儿童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副本。这决定了中国儿童文学在接续新文学传统的同时也要开创自己的传统。“范式”是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的重要概念,该概念对于理解科学共同体的自立及主体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论及范式的生成议题时,库恩指出:“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能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远不是一个累积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宁可说,它是一个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该研究领域的过程。”<sup>[32]</sup>库恩所说道出了时间的远近不是范式建构的标准,范式既可以在修改和扩展中延续,又可以在新的条件下重建。这对于我们阐释中国儿童文学传统建构的方式是有裨益的。就中国儿童文学开创的范型而言,其建构范型的动因在

于文化危机,在区隔旧的文学传统时积蓄着更新的力量,表现为一种新体文学。这其中,思想、语言与人是最为关键的三个向度。无论是哪一种范型,其建构都需要在动态历史语境中阐释、建构,并最终能成为可因袭的传统。

首先来看思想范型。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思想资源主要是关于“儿童”的现代资源,其开创的也是关于儿童现代化的思想范型。这其中,需要辨析的是“儿童本位论”思想。“儿童的发现”要借助成人的现代儿童观的出场,而这种现代儿童观的具体体现就是儿童本位论。儿童本位论树立了儿童的主体地位,从而潜在地推动了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这种思想资源是从外而内的,在新文学思潮的引领下归并于思想启蒙的立人工程中。儿童本位论的提出拉升了儿童文学的思想性,从而驱动了儿童文学现代化的进程。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当这种思想资源被推至极致时,也背离了其思想的本义。具体来说,儿童本位观为了确认儿童的主体性,必然要拉开其与成人的距离,以“非成人”的方式来阐释“儿童本位”的意涵。“质”的规定性抽空了儿童与成人的共同性,制造了儿童/成人具有本质差异的“二分式假设”。<sup>[33]</sup>这种绝对的分殊显然不符合两者作为“人”的共性,生硬的条块分割在保障儿童的权益时也销蚀了其主体性基石。新文化人在试图界定儿童文学时援引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不过,他们有意绕开对儿童文学的描述性阐释逻辑,采用了“类同”与“界分”的方法。先驱者设置了儿童文学的殊异他者概念——成人文学。同时,他们也设置了另一个类同概念——原人文学。儿童与原人类同,于是复演出儿童文学与原人文学的类同性。同理,原人与成人殊异,于是就推导出原人文学与成人文学的绝对分殊。经过这种类同与界分的复演,他们不仅确认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差异,也最终确立了儿童文学的概念本身。其结果借用吴其南的话说即是:成人在发明“儿童”“童年”的同时又完成了对儿童的殖民。<sup>[34]</sup>无论是儿童本位

论还是复演说,原本都是舶来品,在先驱者的中国式的阐释后,演变为一种现代思想资源,创造了一种适应儿童文学发生需要的新传统。诚如吉登斯所说,传统是现代性的产物,它是“被发明”的。<sup>[35]</sup>言外之意,思想资源是外在的,但建立起来的传统却是当下的、内在的。这一思想资源从其发生期开始一直被反复援引,并沉积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规范性力量,甚至在论说儿童文学概念时,常将其论定为儿童本位的文学。这也成为了儿童文学持续“走弱”和深陷自我本质主义泥沼的根本缘由。

其次来看语言传统。从传统建构的角度看,语言是最为直接的资源。与现代文学无异,中国儿童文学所使用的语言是现代汉语。从道器合一的逻辑看,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思想本体。没有不表征思想的语言,语言品质的优劣决定了思想的优劣。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过程中,语言变革在其中起到了先决的作用。扩而言之,现代中国文学新传统的确立,“得力于它所确立的语言体系”。<sup>[36]</sup>从工具性的角度看,文言与白话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但从思想本体上考察,两者却有本质性的区别。这也是文学革命要以语言变革为起点、推手的缘由。白话文成为新文学的语言极大地推动了思想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发展,而思想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推进也反过来促进了语言的现代化。不过,中国儿童文学语言传统的确立尽管受新文学语言现代化的影响,但它不是现代文学语言的简化、浅易化。对此,茅盾将这种看法归结为“缩小论”,他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儿童是“缩小的成人”论的源头。<sup>[37]</sup>事实上,语言的浅易并非区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标志,儿童文学语言的本体特性在于“谁的语言”与“如何转换两代人语言”的问题上。这种文学语言的特性本源于儿童文学概念的特殊性,儿童文学内含了儿童与成人“两代人”的对话沟通,成人作家与儿童读者的分立使得其语言呈现出有别于成人文学语言的样态。中国儿童文学开创的语言传统不是现代文学语



言的微缩版,而是自成系统的现代语言体系,它不是成人作家的“仿作小儿语”,而是基于童年对话后持存着两代人话语协商的语言新形态。伴随着内部分层与分化,中国儿童文学语言也出现了差异性、不平衡性的特点,但整体性的基质却是同一的。

最后来看人学资源。将人置于文学书写的首位是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基本特征,这离不开西方人本主义资源的引入与内化。人的归位扩充了文学的主体性,弥合了人学理念对以形象思维著称的文学的正向作用。自此,“如何认识人与文学的关系”成为了新文学关切的根本问题。受现代启蒙思想的影响,对于“人”的理解超越了其本质的先验论的认知,主客二分的认识观奠定了科学精神的基础,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相分离的局面被破除,从而新构了在“宇宙的秩序”上来考察人的新的科学精神。<sup>[38]</sup>不过,对于人学的思索有一个由笼统到细化、由浅渐深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在历史化中生成的。从启蒙入手必然触及“人”的问题,从而确立了在思想革命的新潮中探求人的意义。此后,伴随着社会革命和中国文化变迁,对“人与文学”关系的思考也不断注入新的内涵。百年中国政治主题的切换必然衍生对“人的问题”的不同表达,儿童文学的人学思想也因时而变,而这种变化恰是传统延传的具体表现形态。中国儿童文学开创的“人学”传统是儿童的发现及现代化,这不仅顺应了“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现代主题,而且在其“新人”想象中开启了走向未来的现代之旅。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拥有共同的新文学传统,并且儿童文学的发展受到现代文学的引领和推动。那么是否可以用现代文学所开创的传统来套用儿童文学传统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原因仍在于两者概念的差异性。两者的同源、同质性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主与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它们在百年中国动态语境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行进轨迹。因而,在有意识地统摄两者传统的一体化时,还要启动各自概

念的主体性。非此,简单的类同无法廓清其传统建构的出发点、过程及内涵,导致一种传统遮蔽另一种传统的偏误,造成传统的资源浪费。毕竟,新文学的现代性内质不是“非传统”或“反传统”所能概括的,作为时间概念和性质概念的新文学有着不同的涵义,粗暴地混同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新文学”本位观的“膨胀”。<sup>[39]</sup>这显然不利于认知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也间接导致了“新文学传统”视域下儿童文学主体性的离场。

#### 四、结 语

传统不是固化的成规,它需要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不断淘洗、淬炼和重铸。中国儿童文学传统的开创离不开古今中外资源的对话融通,并最终在汇入新文学大潮时再造了其自我传统。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共享了百年新文学所开创的人文传统,集结着共有的“为人生”的现代传统,两者丰富的联动扩大了“全人”的生命结构,并行不悖地参与了中国现代化的宏大工程。但是,这种联结并不能以销蚀中国儿童文学的主体性为代价,也不能淹没和遮蔽各自开创传统的个性。面对新文学所开创的伟大传统,中国儿童文学难免会表现出既“渴望置身他处”又必须“置身于自己的时空”的焦虑。<sup>[40]</sup>要确立儿童文学传统的主体性,有必要先界定其在新文学格局中的身份。而这种身份探询要以发生学而非本质论的观点为基准,切近百年中国转型的动态语境,在历史与当下对话的情境下去测度中国儿童文学传统生成的价值与局限,从而以更为客观科学的态度审思中国儿童文学的性质与品格,为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提供理论资源与智力支持。

#### 注释:

[1] 耿传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视——从精神指向的变化看近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古今之争》,《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2期。

[2][27][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0、11页。

[3]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页。

[4]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0页。

[5]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第2卷第4号,1921年1月15日。

[6][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7]陈思和:《“五四”文学:在先锋性与大众化之间》,《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8日。

[8][美]王德威:《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

[9]李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

[10]温儒敏:《再谈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边界”与“价值尺度”——由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引发的研讨》,《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

[11]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思想革命”》,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年,第163-164页。

[12]王泉根:《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文艺报》2018年7月4日。

[13]周晓波:《儿童文学文体分类的历史性和新基点》,《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

[14]刘绪源:《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第3页。

[15]朱自强:《“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8页。

[17]陈晓明:《现代如何开创?如何成形?——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一》,《文艺争鸣》2021年第5期。

[18][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6-189页。

[19]罗岗:《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读〈阿Q正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0][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5页。

[21][美]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291页。

[22]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23]耿传明:《时空意识的嬗变与中国小说的现代性转型》,《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24][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25]吴翔宇:《重申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26]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28]严家炎:《区域文化: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4期。

[29]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30]王铁仙:《两种中国文化传统:区分、辩证与融通》,《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31][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32][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8页。

[33]杜传坤:《转变立场还是思维方式?——再论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本位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34]吴其南:《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5页。

[35][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36]温儒敏、陈晓明等:《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2页。

[37]茅盾:《一九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茅盾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485页。

[38][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8页。

[39]高玉:《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本位观批判》,《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

[40][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9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